

日本汉学家宫岛大八的对华观分析

Analysis of Japanese Sinologist Daihachi Miyajima's Views on China

沈焱煊¹

Yaohuan SHEN

中国杭州市钱塘区崇德实验学校

Hangzhou Qiantang Chongde Experiment School, China

sinngiokann@foxmail.com

摘 要 宫岛大八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汉语教育家，师从清末名儒张裕钊。一生从事汉语教学的宫岛大八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印象中都较为正面，但通过分析宫岛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起草的对清策、流离归国途中写的汉诗、日俄战争前后编写的教科书及时事评论，考察其词句用例、行文逻辑、核心思想，再结合宫岛自身及其父亲、友人、学生的对华行为，就能发现他一面标榜中日和平、尊师爱友，一面却间接性地服务于日本政府扩张侵略政策的这种矛盾的对华观。

关键词 日本汉学家；宫岛大八；对华观

Abstract Daihachi Miyajima (1867-1943) was a famou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or in modern Japan who studied under Zhang Yuzhao, a renowned schola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iyajima dedicated his entire life to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was widely regarded positively in both Japan and China. However, a thorough analysis of his strategies towards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his Kanji poetry written during his exile, his textbooks, and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 along with an examination of his language usage, writing logic, and core ideas, combined with an evaluation of their behaviors of his father, friends, students and his own towards China, reveals the contradictory attitude he demonstrated towards China. While advocating for Sino-Japanese peace and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friends, Miyajima indirectly supported Japan's expansionist and aggressive policies towards China.

Keywords Japanese Sinologist; Daihachi Miyajima (1867-1943); Views on China

一、引言

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利，日本“慕华”思想悄然改变，他们发现一直信以为师的中国不再强大，不过当时这种想法只是稍显苗头。直至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日本对华的优越感达到一定峰值，从轻视转为蔑视，对华扩张的野心昭然若揭。而日本汉语教育史上的名师、著名汉学家——宫岛大八（Daihachi Miyajima），恰好活跃于这个复杂的时间节点。

宫岛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总体保持着一种敬仰的态度。他在清留学期间，甲午战争爆发，他的导师张裕钊离世，宫岛是唯一完成服丧流程的弟子，这一事迹成为了师生情谊的典范、中日友好的见证。回国后，虽仍值战争期间，但宫岛拒绝了军队随行翻译岗位，²转身投向东京帝国大学作

收稿日期：2023-01-21。

作者简介：¹ 沈焱煊，男，中国杭州市钱塘区崇德实验学校教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史。

²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61052100、陸軍省村山少佐宛 大本営副官大生大佐宛 宮島大八通訳官と為すこと本人辞退(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一名讲师并开设了私塾，主讲汉语和汉学。与含政治因素的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汉语教学不同，宫岛“高远廉洁”的教学理念吸引了许多赞同“亚洲主义”的人。这无疑是受到了留学中国时导师张裕钊的影响，宫岛这一生都在追求其师洁身自好的生活方式、献身学问的学习方式、全面发展的教育方式。到了昭和时代，热爱中国文化，主张“日中不战”的宫岛在公共场合的发言随之减少，学其师的处事方式，以教育者、书法家的身份度过了一生。

由上可见，宫岛大八为日本的汉语事业奋斗一生看起来是出于对汉语的热爱、对恩师的敬仰，似乎并没有侵略的目的。但通过他所写的文字材料发现，他的对华观并未如大众所想的那般简单。本文将依据宫岛大八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以及日俄战争前后所写的文字材料为依据，并通过宫岛自身行为，结合其父亲、友人、学生的思想行为，探究宫岛在特殊时期的对华观是应时而变还是始终未变。

二、宫岛大八的生平

宫岛大八 1867 年生于日本江户时代的米泽藩（今山形县米泽市），受其父亲宫岛诚一郎的影响，他从小就对汉诗文颇有兴趣，11 岁便成为胜海舟（Kaishū Katsu）的门生。¹1871 年，因为胜海舟工作调动的关系，其全家也一同随他迁居东京。宫岛 13 岁时机缘巧合地跟清朝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部下黄遵楷学习汉语，之后就读于其父创立的“兴亚会支那语学校”学习北京官话，1882 年又转入东京外国语学校。

宫岛于 1887 年得到了去中国留学的机会。当时的公费留学生清一色地去北京学习，而自费留学的宫岛大八却拜入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的门下。张裕钊是清末著名文人、政治家、书法家，也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宫岛入门后，又因张裕钊的工作调动，随至保定、武昌、西安等地同行学习，直至 1894 年张裕钊离世，学习达七年之久。

甲午战争爆发后，已归国的宫岛听取了胜海舟的建议，于 1895 年创立了教授汉语和汉学的私塾“咏归舍”，并执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学校。1898 年“咏归舍”扩张并改称为“善邻书院”，1901 年宫岛辞去讲师的工作，专门经营书院直至去世，他的一生近乎都奉献给了汉语教学事业，他离世时中国存在时间最久的汉文日报《盛京时报》还特地发表了讣告，称其为“多年尽瘁日华提携之善邻书院院长宫岛大八氏”。²

他的人生轨迹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在华留学后回日本做老师，其成长与生活环境也近乎都与中国相关，包括和最早提出“亚洲主义”的胜海舟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但是宫岛的对华认识，并没有从日本人传统的思想中跳脱出来，以下一些文字材料可以证明这一观点。

三、甲午战争爆发后起草对清策中的对华观

1894 年是宫岛在清留学的最后一年，服丧张裕钊之后，同年 7 月 25 日，甲午战争爆发，他 8 月 29 日离开西安，9 月 28 日到达上海，10 月 13 日到达日本东京。³当年 11 月他写下了三篇表达自己

¹ 胜海舟（1823-1899）是明治时期的政客、日本近代海军的创设者，同时也是宫岛大八父亲的朋友，宫岛在 11 岁时成为了他的门生。胜海舟主张中日联合共同对抗欧美，该主张是早期亚细亚主义的萌芽，也是宫岛对华思想的来源之一。

² 《宫岛大八氏》，《盛京时报》1943 年 7 月 11 日。

³ 宫岛诚一郎：《宫岛诚一郎关系文书 2658》。

作为一介书生对时局看法的文章,分别是《北京不可冲论》《对清策》《对清策趣意书》。其中用文言文体的汉语书写的《北京不可冲论》是开篇之作,用大量的假设表达进军北京的否定态度,奠定了三篇时评的立场基调。三篇时评中篇幅最长,叙述最详细的《对清策》是具体的策略方针及理由,用日语书写,共三条。《对清策趣意书》也是用日语书写,作为三篇时评中的思想指南,强化以“仁义”为名的讨伐策略。三篇时评互为补充,直观地体现了宫岛的对华思想。

(一)《北京不可冲论》中的对华观

全篇 718 字的《北京不可冲论》,用文言文的形式体现了宫岛深厚的汉语功底。该文开篇表达了他反对进攻北京的意愿,认为进攻的话就会造成教匪的祸乱;其次谈到了当时清国“日赴衰运,举土骚扰,民人怀乱”的社会背景,通过“论者”的乘虚而入从中取利之说和“讲对清之策者”的惩罚过错、割地赔款之说,引出自己的观点——北京的门户在,才有让其割地赔款的机会;最后指出自从英国人加入太平天国运动后,叛乱事件没有哪一件不是欧洲人挑起的。内乱一旦发生,欧洲人便持续地对清政府发难,如此才能让他们肆意地坐收渔翁之利,有时冒义战之名,有时假救助之义,拿了政府的钱财,大力制造器械,引诱清政府购买。

文章紧接着谈到清朝那些想发动起义的人,因为眼红一时的救济,无暇长远考虑,所以会用土地贿赂,用钱财利诱,都抢着去巴结这些欧洲列强们,唯恐失去欢心,甚至愿意把整个清政府的疆域都委托给他们。于是法国得以进入越南之境,俄国得以蚕食塞北之野,英国则已经失去贸易互市的利益,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像德国、意大利,哪个又肯安然漠视,必定个个都磨爪利牙,为其所趋之利而向前。然后以一块肉投入豺狼群中为例,认为清国灭了的话,日本就陷入了唇亡齿寒的境地,更别谈“征韩侵华”的未来大计了。可见,宫岛在华留学期间,“侵华”的态度就已经初露苗头。他虽然不支持进攻北京,但是从头至尾把中国归为一块任人宰割的俎上肉,并建议日本政府抓住乘人之危的机会。表面上打着帮助朝鲜独立,帮助清政府走上文明开化国的幌子,实质上已经滋生出军国主义的端倪。

(二)《对清策》中的对华观

《对清策》全文共 21 页,用日语书写,主要提出了三条对清策略:一是“讲和”;二是“满洲占领”;三是“城下之盟”。

这三条策略按照优先实施的程度依次展开叙述。第一策“讲和”并非字面意思,实质上是为了惩罚镇压朝鲜农民起义失败的清军,让清政府与日本政府“讲和”,被迫让清政府割地赔款的政策。这条政策和上文的《北京不可冲论》不谋而合,都有觊觎中国的土地和钱财的意图。

第二策“满洲占领”是在“讲和”失败情况下的策略,宫岛用多达 14 页的篇幅详谈此策,认为满洲的地势极佳,物产、资源也极为丰富,是日本政府扩展地理版图的必选之地,还提出要先占领副首都奉天,同时要尊重中国的风俗,保持日军的好名声才能达成最终目标,并且推荐四季之中的冬天最宜行动,可见宫岛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都为日本政府侵华行动提供助力。

第三策“城下之盟”仅 1 页篇幅,宫岛认为实属下策,如果进攻北京,政权瓦解,不仅造成内乱,其他列强便坐收渔翁之利,那么就等于前功尽弃。所谓“前功”就是日本为侵华征韩所作的准

备，从“前功尽弃”一词证明了宫岛认可日本政府侵华的对华态度。

（三）《对清策趣意书》中的对华观

《对清策趣意书》共 3 页半左右的篇幅，该文也是用日语书写，主要围绕着“以仁义之名”的宗旨，厘清了宫岛对时局的想法。

宫岛在文章开头把自己定位为一介书生，并非指挥全局的政治家，他此时的出发点是基于一个读书人对时局的看法，而在该处提到的想法就是议论的核心。此部分论述部分经笔者汉译如下：

赌上一个国家的命运来争那个胜负。正义且有见识的人如果看到了这个，会产生“为什么会喜欢争斗”的疑问。幸运的是虽然我国（指日本）连战连胜，但是那位旁观者（指俄罗斯）贪婪得像老虎和狼那样磨练牙齿和指甲，以期抓住好机会。

如果不幸的是清国灭亡的话，其结果说起来也很痛苦。吾皇开国已有两千五百余年，冠绝于万国，赌一国而进行大运动者必有其道。现在赌上一个国家的命运来争胜败，真是万不得已。¹

这里高频次出现的“赌上一个国家”中的国家指的是日本，是时正值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微妙之际，两方都对东北三省的领土占有虎视眈眈。日本之所以敢赌国家的命运，是因为日本在 1874 年侵略台湾、1875 年侵略朝鲜、1879 年吞并琉球的扩张战争中尝到了甜头，从而提高了信心，所以文中宫岛说“连战连胜”。然而俄罗斯作为军事强国，日本仍有所忌惮，但 1891 年 3 月，俄国为了控制远东地区而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日本朝野受到极大震动，认为日本的利益受到极大威胁。因此，日本要想控制朝鲜及满蒙，实现其大陆政策之目的，就必须打败俄国这个竞争对手。因此，在这篇文章写完的次年，日俄战争爆发，不仅是对中国神圣领土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也使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空前的浩劫。概览宫岛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起草的这三则针对清朝的策略，可以看出宫岛的对华认识在中国留学时就受制于自身国家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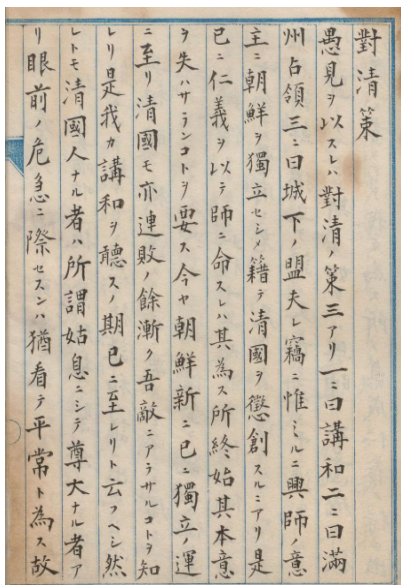


图 1 《对清策》首页影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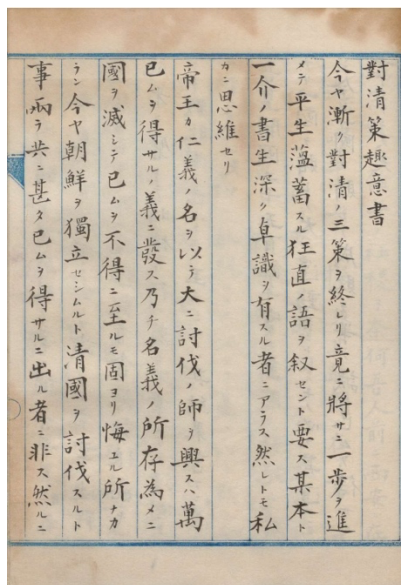


图 2 《对清策趣意书》首页影印图

¹ 宫岛大八：《对清策趣意书》，《宫岛诚一郎关系文书 2658》。

四、日俄战争前后所编汉语教科书与所写时评中的对华观

宫岛回国后,为其创办的汉语学校编写了不少汉语教科书,其中的《支那语独习书》(1900年)编写于日本派兵镇压义和团之际,是一本披着会话外壳的军用书。¹虽然全书没有直接的军用语表达,但仍能寻到一些蛛丝马迹。由善邻书院编纂的《支那语速成:兵事会话》(1904年)正好编写于日俄战争爆发时期,²在凡例中就说明了该书的编写目的。大正5年(1916年)4月3日,宫岛对“支那问题”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³写下了《时事鄙见》一文,在该文中,他提出了“一分南北”的计划。

(一)《支那语独习书》中的对华观

明治维新后,日本出现了专门的汉语学校和专职的汉语教师,随之也涌现了大量的汉语教材。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教材的编写倾向悄然变化,从《支那语独习书》就可见其端倪。

《支那语独习书》是宫岛大八归国后系统化编写的第二本教科书,于明治33年(1900年)9月10日印刷,明治33年9月16日正式发行。当时的世界格局强弱两极分化,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各国列强的“俎上肉”。而此时的日本正享受着明治维新带来的红利,得以从亚洲各国中跳脱出来,其战略思想也从传统的维护以儒学为官学的封建幕府的统治转变为对外殖民扩张。英俄在远东地区的竞争关系为日本提供了战略空间,日英在遏制俄国向中国扩张的问题上持有相同立场,为此1900年7月日本派兵约22000人镇压义和团,成为了八国联军的主力,自此日本正式成为列强的一员。此后日本的汉语教学、教材逐渐蒙上了军事色彩。《支那语独习书》作为该节点的教材,在“凡例”中也提到:“在现时感到需要汉语之际,这本小册子多少会有裨益。”⁴这里的“现时”就是日本派兵镇压义和团之际,显然该书是为去北京的日本军人而准备的。

《支那语独习书》的话题虽以日常生活为主,但结合时况,教材也不乏一些军事词,如兵丁(名辞二十三页)、营房(名辞二十六页)、旗子(名辞二十八页)、兵船(问答八十四页)、兵营(问答八十五页)、操演(问答八十五页)等。其中有三例耐人寻味:

(1)【团匪】义和团。

都是甚么事情?

都是团匪的事情。⁵(问答七十页)

1900年3月6日,驻清公使西德二郎向外务省报告了山东拳民的活动。4月7日,他提到义和团只不过是“没有固定方针的土匪,不会引起大事”。⁶这可以侧面反映当时日本人对义和团的态度,认为他们是迷信、愚昧、落后、反基督教的“乌合之众”。而宫岛把“团匪”日译为“義和団”。宫岛明知其正确叫法,反而用了“团匪”这一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这反映了宫岛对义和团的态度,也侧面反映宫岛对日本派兵镇压义和团的认可。此处呼应了凡例中,现时之需的“现时”正是指1900

¹ 为最大程度保留原书的风貌,故不做改动,不存在作者主观翻译。

² 善邻书院由宫岛大八于1895年5月创立,最初名叫咏归社,1898年6月改称为善邻书院。该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汉语人才从事军事翻译工作。

³ 当时日本人对中国问题的统称。

⁴ 宫岛大八:《支那语独习书·凡例》,第11页。

⁵ 宫岛大八:《支那语独习书·问答》,第70页。

⁶ 王小明:《义和团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转型——立足于近代民众抗争运动的比较分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年第1期。

年日本派兵镇压义和团之时，虽然该书的军事内容不多，但可见其编撰目的就是军需。

(2)【放枪】射击。

那是甚么响声儿？

是兵营里头操演放枪的声儿。¹（问答 八十四、八十五页）

“放枪”一词是清末民初枪炮传入中国以后的新词。这里的兵营虽没有指明是哪国军队，但可以推测是中国军队，第一，从战绩来看外国军队在来华之前就为精兵，故不太需要训练放枪这种基础军事练习，即便需要也是通过实战积累经验。第二，教材是以中国社会为背景编写的。因此这两句问答显然描述的是中国军队的射击训练。初看貌似无大问题，但实则是对中国军队的讽刺。当时作为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前身——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甚至连英语的口令都已听熟悉，却唯独对瞄准射击一窍不通，可谓“只知放枪，不会瞄准”，其战斗力就可想而知。²从这些对于淮军的描写来看，宫岛在此安排这两句对话颇有深意、十分微妙。

(3)【总布】北京一地名。

舍下在总布胡同住。³（问答 六十一页）

这里的“总布”虽只是一个地名，但背后的故事却为中国之耻，1900年6月20日，清兵神机营统领崔恩海将肆意挑衅、张扬跋扈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击毙于西总布西口外。这成为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主要导火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辛丑条约》仍在谈判中，清廷就照着八国联军公使团的要求，在事发地点为克林德建大理石牌坊，额题由光绪帝亲写“克林德碑”四字被视为国耻。⁴而同年9月，宫岛就编成《支那语独习书》，运用“总布”这一国人之殇的敏感词汇编入教材，可见编者内外矛盾的对华观。

这三处用例都是宫岛对华观的体现，他擅长把一些隐晦的间接的词汇编入教材，无意中体现了他的对华态度，这种间接性的侵华思想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事业生涯，但他却又主张儒教，崇尚“亚洲主义”，这种矛盾的作派难以从国民性上根除。

(二)《支那语速成：兵事会话》中的对华观

该教材版权页处的编辑兼发行人正是善邻书院的创始人宫岛大八，于明治37年（1904年）2月17日印刷，20日发行，而日俄两国于2月10日正式宣战，教材的编写不太可能在短短一周内完成，可推测这份教材的编写工作早有谋划。日俄战争中，日方和俄方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日本为了弥补自己的劣势，从各个方面积极应战，企图通过编写汉语教科书让日本兵学会基础的汉语表达，便于向中国人征集物资、收集情报等，也有利于命令中国人买东西、干苦力、照顾日本伤员等。可见，军事需要是该教科书编撰的首要背景。

《支那语速成：兵事会话》的凡例（译）写到：“此书专为在战地使用而编纂……此乃军国多事之秋，若能使忠勇义烈的出征将士有所裨益，则为著者之本意。”⁵这与《支那语独习书》凡例中

¹ 宫岛大八：《支那语独习书·问答》，第84-85页。

² 陈九如：《洋枪队与淮军浅论》，《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4期。

³ 宫岛大八：《支那语独习书·问答》，第61页。

⁴ 朱鹰：《北京总布胡同：记载六百年历史变迁》，《北京青年报》2003年10月9日。

⁵ 宫岛大八：《支那语速成：兵事会话·凡例》，第1-3页。

的“在现时感到需要汉语之际,这本小册子多少会有所裨益”相似,先指出“现时之需(义和团事件)”“多事之秋(日俄战争)”这类背景,再使用了“裨益”这个词语。通过这种表达方式就可以看出,宫岛编写教材的目的就是应时之需,而且从未改变过,一旦有国家有号召,便积极响应。1904年除了出版了该书之外,同月还出版了《北清通语:兵时会话》,3月又出版了《兵时告示文范:清国时文》,8月出版了《官话急就篇》,12月出版了《官话时文问答》。¹仅仅一年的时间连续出版了5本教材,其中三部在书名中就体现了军事元素。善邻书院为日俄战争期间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出版起到了较大的示范作用,为后期军用汉语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范本。可见善邻书院并非一个纯粹的汉语学习重镇,而是应时之需,培养汉语型国土的基地。

该书的凡例前面,有一张包括中国东北及辽东半岛在内的地图,详细标注了长城、边柵、旅行线、山岳、河川、国界、省界、未成铁道、铁路线路。地图是行军作战的重要工具,宫岛在这部书中加入地图,无疑是想让日军快速了解作战场所的地理信息。

该教材的目录中的“行军、宿营、运输、土工、警戒、讯问、看护、慰抚”更是直观地表现了该书军用色彩。令人疑惑的是,宫岛在清朝学习的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古典汉学,对于带有命令性、恐吓性、安抚性、拉拢性的军事用语竟也如此熟悉。比如“不用害怕说实话我不杀你”这句,²难以置信是出自一位标榜“中日不战”的汉学家之手,“你们不是我的仇敌,我们是替你们打俄国来的”这句在安排“慰抚”这一节,³看似是为安抚中国平民的情绪,实则打着帮忙的幌子侵略中国土地,这种两面性的人格在该教科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时事鄙见》中的对华观

《时事鄙见》写于1916年4月3日,此时中国的格局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宫岛说“为了我国的大局,解决同洲的根本,要等一个成事的机运”,这个时机便是等袁世凯倒台后,中国人的特质“嫉视、猜疑、权势之争”就会相继而起,中国便陷入混乱的局面。之后宫岛提出了解决的方针(译),这便是全篇的核心要义。

最好的方针便是建立一个以蒙满为基础,以肃亲王为中心,兴升允,联络陕甘肃,恢复宣统的旧位,响应那些仍在观望中的、无家可归的旧官僚,比如冯国璋。这样北方的根据地就成了。为了南方,设立南京为首都,公平地选择人才,选张继这样的人作为首脑。北帝制,南共和,大陆平分南北。⁴

之后,日本帮助清政府建立满洲国,作为支持者之一的宫岛大八,在1935年4月8日的《朝日新闻》朝刊第1版上,刊登了溥仪作为满洲国皇帝来日的新闻。其中,在“通报对建国帮助的二十名人员的内谒本”上,记载着与陆军相关人员一起没有头衔的头山满和宫岛大八的名字。同时,在东京丸之内的山水楼拍摄的溥仪和宫岛的纪念照片也留了下来。这足以证明,宫岛在这个时期所提倡的亚洲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支持蒙满独立,建立满洲国。这与十年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奏折中写

¹ 《官话时文问答》的发行所是善邻书院,编辑兼发行人是宫岛吉敏。据《人事兴信录》的电子数据库记载发现,宫岛吉敏于1882年出生,父亲是宫岛季四郎,而宫岛大八的父亲宫岛诚一郎的弟弟正是宫岛季四郎,因此推出宫岛吉敏是宫岛大八的堂弟。

² 宫岛大八:《支那语速成:兵事会话·讯问》,第86页。

³ 宫岛大八:《支那语速成:兵事会话·慰抚》,第91页。

⁴ 宫岛大八:《宫岛诚一郎关系文书·时事鄙见2659》。

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理念完全吻合。1936年他又亲自拜访满洲国，帮在义和团事件中去世的朋友德丸作藏还愿，还把自己雕刻的毗沙门天王像进献给了溥仪。次年，抗日战争便全面爆发，不仅让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也给日本社会带去苦难，宫岛这时才反应过来自己一直信奉的亚洲主义早已走偏，是以日本为首的亚洲主义，而不是亚洲的亚洲主义。

晚年的宫岛在东亚同文会的《续对支回顾录》写道“因为对时事有所察觉，从几年前开始就断绝了一切与政治有关的言行，将力量倾注于世道人心的抚养……”，他认为自己早年前写的有关时事的言论失之偏颇，因此心存愧疚，以教育者的身份度过。最终宫岛于1943年患肠疾去世，他在中日持续战争的环境中离开，也没能见证他在《时事鄙见》中提出的“支那问题的解决是确立东洋的基础，是世界和平的开端”这一美好愿景。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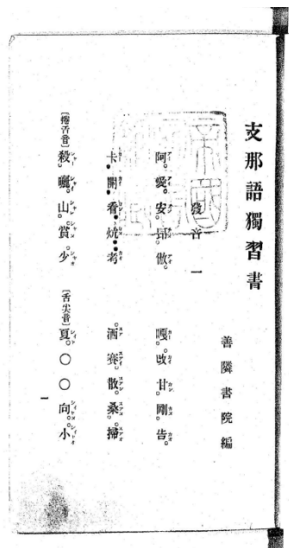


图3 《支那语独习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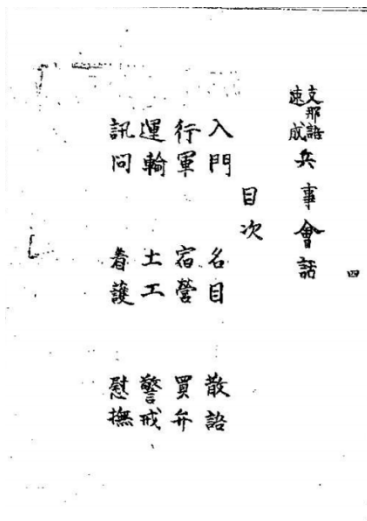


图4 《支那语速成：兵事会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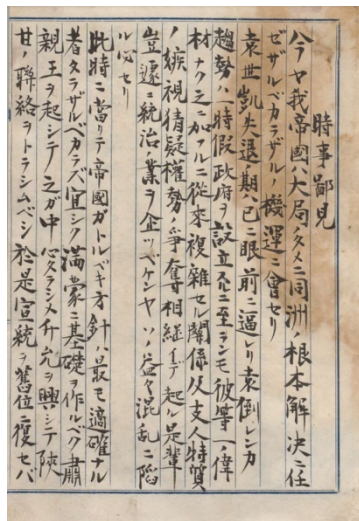


图5 《时事鄙见》

五、宫岛大八矛盾的对华观分析

从上述文字材料可见，宫岛大八的对华观呈现出一种矛盾的两面性，实质上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在中国的时候，表面上宫岛是一位不谙世事的留学生，背地里却拜访日本设立在中国的间谍机构——乐善堂；回到日本后，他表面上初心不变开设汉语私塾，背地里却培养一大批军事汉语储备人才，间接助力日俄战争。这种两面性与日本政府对华侵略扩张的一体两面极为相似。一面宣扬“中日提携”一致对外，一面却“脱亚入欧”，将矛头直指中国，这两面在甲午海战胜出的事实面前划为同一。

但宫岛是个体，政府代表群体。两者的对华观相似，却终究不同。宫岛对中国文化的感情不假，这从他对汉语、汉诗文、中国书法、儒道的热爱看得出来。宫岛对中国人的感情却仅限于他身边熟知的中国人，也就是以张裕钊为圆心的一众人等。宫岛对其师傅的感情只能反映其尊师重道的精神，但并不能说明他一视同仁地尊重每一个中国人，只能说因为他的师傅，他对中国人心存一丝好感或

¹ 宫岛大八：《宫岛诚一郎关系文书·时事鄙见 2659》。

怜悯。宫岛对中国的感情其实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他们既羡慕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又不甘于本国的边缘属性；既想向中国学习，又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这就使得宫岛对中国的感情近乎只剩下文化认可。他回国后创办了善邻书院，在撰写《善邻书院主意书》时宫岛大八提到“一日无孔教则无清国，无清国则无支那，孔教可谓清国之根本，而孔教之消长攸关支那存亡，抑亦亚细亚盛衰之所系也”，可见他十分崇尚孔子及儒教，但是另一面他却认可日本通过非法、残忍的手段在中国牟利。

对此现象，小岛晋治在为《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撰写序言时有所归纳，他表示在那个时代，许多日本人对古代的中国文化仍怀有敬意，而对现实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蔑视意识却不断加深。这种时代的风气，也反映在该书所收录的众多旅行记中。如果说上述文字信息所透露的信息只能从侧面推测宫岛的对华态度，以下四个人际关系视角更能佐证他的这种摇摆且矛盾的对华观。

（一）对恩师和同门的态度

宫岛于1894年8月离别张家之际和甲午战争爆发之时，在归国的途中带着复杂的感情写下了《甲午诗草》，共有八首。这几首汉诗用词用典都极为丰富，证明了宫岛留学期间确实学有所成。《岷昆仲》是送给求学的同门，“甲午八月闻两国失之和报 辞长安归国赋别张导”一句说明了该诗的写作对象，此处的张导不是张裕钊，而是一位名叫张导岷¹的同窗，宫岛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昆仲（古时的兄弟称呼）和朋侪（指朋友），表达了即便半生戎马也要相见的期许。《感怀》《襄阳怀旧》中的“此去问经何处是”和“无限伤心人不在”最直接地表达了对导师离去的痛苦。在《七盘岭》连续出现两个“忧”，一是对自己的处境担忧，二是对时局的担忧；《洞庭夜泊》借舜帝南巡死于九嶷山，其妃子娥皇、女英来到湘水边哭祭丈夫的典故，引出“忧汉室”，其实是对中国的担忧。在《阳台》中借用宋玉为襄王作高唐赋的故事，影射自己来清国留学也如梦一般结束了。而在《黑龙洞夜坐》和《武昌》中，“空有归心万里驰”“归家无计此淹留”两句表达自己归心似箭的感情，还借用南冠楚囚的典故，该典故多用于虽身处敌人的营中，但是依旧想念着自己的故国的情形。

综上，虽然宫岛对导师、同门都很尊敬，但是战争爆发后他便认为中国是敌国，并且始终将国家置于首位。

（二）受友人影响

松平康国（Yasumoto Matsudaira）是动摇宫岛大八对华态度的一个重要角色。两人相识甚早，在善邻书院设立后不久公布的“支那文学语学教授”名单中，宫岛大八兼任文学科和语学科讲师，松平康国则担任院长，同时也是文学科讲师。自幼便受汉文经典熏陶的松平康国对以儒为尊的中国抱有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来自书本的涵养，也与师友之间的日常交流有关，善邻书院就是“兴亚者”们的集中营。但来华之后的松平康国对中国社会经济、风俗习惯和文教制度都深感失望，担忧清王朝的前途，同时也流露出他作为日本人的优越感。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善邻书院的院长松平康国对当时去留两难的宫岛赠诗一首，诗中松平康国表示理解“留违君父去违师，游子低回

¹ 宫岛自7月29日离开西安后便记录每日行程，名为“开战以来日表”，在其中8月29日中记录了自己同张导岷等人在张裕钊的灵前烧香叩拜，随后辞别。日表中的记录与此处的《甲午诗草》的“岷昆仲”“赋别张导”相吻合。

欲泣岐”¹的矛盾处境，但又劝导他“酒醒休唱洞庭诗”。宫岛虽没有对这种观点在明面上表示赞同，在宫岛心里早已潜移默化地认同松平康国的这种对中国失望的态度。曾经站在同一阵营的两人，最终都走向以日本为首的“亚洲主义”，这也说明了宫岛的思想轨迹绝非当时的个案。

德丸作藏（Sakuzou Tokumaru）是宫岛在兴亚会时的同学，²宫岛继承了他的遗志，设立了“镇海观音会”，在观音会上继续举办法事和法事会。³这个插曲虽然体现了宫岛重情重义的品质，但可以看出他对日本镇压义和团一事的认可与赞同。而且，记载这个事迹的“黑龙会”是当时日本侵华的急先锋，成了日本浪人的大本营。黑龙会成员们认为日俄必有一战，并且预计战场就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正好契合了他们扩张的首要目标——黑龙江两岸，所以定会名称为“黑龙”。这也是宫岛支持蒙满独立的有力证据。

（三）受父亲影响

家庭环境也是造成这种矛盾的重要原因。宫岛的父亲宫岛诚一郎出生于藩士家庭，自幼受严格的汉学训练，长大后也成了藩士。出于对汉诗文的热爱，在首任驻日大使何如璋等抵达日本后不久，宫岛诚一郎就用切磋诗文等各种手段与公使馆成员建立了深厚友谊。不过诚一郎还肩负着为日本政府提供情报的特殊使命，尤其是琉球问题，他通过使团成员不经意透露的外交情报了解到格兰特调停球案的机密，使日本政府赢得了球案交涉的主动权，赢得了日本政府的认可。自身的爱好终需服务于国家的使命，这是宫岛诚一郎国士精神的体现。宫岛大八深受其父亲这种国士精神的影响，以至于他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国士。

（四）其学生的表现

宫岛为当时的中日战争输送了大量懂汉语的翻译和军官，日俄战争期间，有40余名善邻书院的学生从军担任军官、翻译及其他职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军出兵中国山东，有二十多个学生从军做翻译或者其他工作。青柳笃恒（Atsutsune Aoyagi）是宫岛的首届学生中较为出名的一个，他也继承了宫岛的“国士精神”，把成为一名真正的国士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还成为了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编写了一些教材。

青柳在1913—1914年间担任袁世凯的高等间谍，其对华观更是锋芒毕露，对1915年日方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之时进行公开评价，美化称日本是为了生存才向中国“伸手”，这是上天赋予的权利。青柳所宣扬的“中日友善”“经济联盟”只是将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正当化，从未站在中国的立场思考。可见宫岛“人物をつくるにあり、区々たる言語にはない”（成人，而非成各种语言）的教育目标在青柳身上得到诠释，⁴自己的价值和抱负也在这些学生的发展中得到体现。田中庆太郎曾这样评价宫岛大八的教育目标，“他的作法是要培养有志于大陆的青年，不是所谓学者型。”⁵这正是为了适应当时国家的需要。作为那个时代的人，在“忠君”“效国”思想的感

¹ 松平康国：《天行诗钞·赠宫岛咏士》，第25页。

² 德丸在甲午战争时是陆军翻译官，1897年成为外交部翻译官在北京公使馆工作，在任期间发生了义和团之乱，在北京筑城时，用北京一古刹的僧人带来的观音像治好了病，因此信仰观音。外务省退休时，在宫岛的义兄上泉德弥陆军中将的斡旋下，德丸在朝鲜的镇海建立了观音堂，为义和团之乱战死者祈福，但德丸却在镇海突然去世。

³ 黑龙会：《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第734页。

⁴ 邵艳：《早稻田大学的中国语教育》，《研究论丛》2004年第11期。

⁵ [日]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召下,对国家的非正义的决策或积极追随,或摇摆,或迷茫,很多因素都是时代造成的。

六、余论

在全盘西化的日本,自身又不舍对汉学的热爱,原本对立的两面在帮助政府解决燃眉之急中划为同一,宫岛的作派可谓是“曲线救国”的典型代表。这种国家与个人的矛盾最终也会因个人的价值取向化解。即便宫岛在后期意识到自己的对华观没有达成相应的目的,使中日两国陷入战争,之后便用余生以教育者的身份活动来填补自己的愧疚。

宫岛上受父亲、友人影响,下影响其学生。他们带有目的性、效忠军国主义的伪善受时代的局限和“国士”思想的禁锢,至今日本政府仍美化战争,正当化自己的罪行,日本民众浸润在这种环境中也始终无法正视历史。纵观宫岛大八的生平,八年的留学经历带给他扎实的语言功底,在汉语的传播与发展上作出巨大贡献,他编写的汉语教科书,已出现汉字简化的苗头,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汉字的发展,新鲜的日源词反哺了当时汉语的词汇系统;他将张裕钊的碑学派书法广为传授,在日本形成了张氏书法流派。

但他仅仅只是做到了为日本服务的“亚洲主义”,“培养国士”的教育观为他提供了心理支持,实质上却效忠于日本的军国主义,为其编写军事教材,培养军用翻译人才,支持蒙满独立,提出他认为和平的时评见解。他的这种对华观,实质上谈不上“慕华”到“侵华”的转变,他的“慕华”只归结到了深厚悠久的中国文化和汗牛充栋的汉学上,自始至终没有从“国家”的角度承认中国,陷入了日本“万世一系”的思想窠臼。宫岛的这种对华观是当时绝大多数日本亲中派对华态度的折射,他们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给中国这片土地与人民带来灾难,我们也当辩证地看待。

参考文献:

- 曹然. 略论日俄战争的背景及影响[J]. 世纪桥, 2010(17): 33-35.
- 戴东阳. 近代中日同盟思想的表与里——以宫岛诚一郎为例[J]. 史学月刊, 2013(12): 78-90.
- 荆绍福. 沈阳北大营[M].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20.
- 孙宏云. 日本汉学家松平康国的对华认识及其政治倾向[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61(3): 96-106.
- 王美平.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J]. 历史研究, 2012(1): 143-161+192.
- 王美平. 近代日本的义和团运动观[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 71-80.
- 王顺洪. 日本明治时期的汉语教师[J]. 汉语学习, 2003(1): 75-80.
- 徐丽. 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研究[D]. 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 (日本) 魚住和晃. 宫岛咏士: 人と芸術[M]. 东京: 二玄社, 1990.
- (日本) 板垣友子. 明治期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 宮島大八の学びを中心に[J]. 外国語学研究, 2014: 17-23.

(责任编辑: 侯佳琪)
(日文献编辑: 刘洁)